

這些東西千萬不能代購 會被抓坐牢甚至判刑 10 年

現如今代購已經成爲一種潮流吃的、穿的、用的……只要有賣的，幾乎都有國內人要代購的。回想下在 Costco 里，但凡有打折活動，肯定就會湧入一批海外代購。

然而，有一種東西是千萬不能代購的，因爲如果做了就很可能被抓坐牢，最高可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

這種東西就是藥品。

加拿大和美國生產的藥品往往療效好、質量標準高，以至於出現了代購藥品的現象。由於藥品郵寄時限制較多，有的人會在回國時帶上一箱子藥去國內銷售。

加拿大銷售的抗過敏藥和兒童藥品很受國人歡迎。

德國糖漿、小綠葉噴霧等，都是代購清單里的常客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私自代購的藥品屬於“未經批准生產、進口”範疇，將其銷售的話，就觸犯了中國法律。

此前就有，在朋友圈大肆宣傳代購兒童藥的母嬰店，因“無藥品經營資質、無藥品進口手續”被取締。那些從加拿大代購來的藥品則被認定爲假藥，這種銷售行爲已涉嫌犯罪。一旦犯罪行爲坐實，除了自己要付出相應代價，爲她代購藥品的朋友也會被牽連在內。

根據中國藥品管理法規定：藥品進口，需經有關部門審查，確認符合質量標準且安全有效的，才能進口，並發給進口藥品註冊證書。

沒經批准、私自進口的，均按假藥處理！

也就是說，代購過來的藥品，是不是

假藥，並不取決於藥品本身。

通過代購藥品盈利，很可能觸犯銷售假藥罪，而這種行爲最高可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

所以，回國時攜帶藥品，有幾點必須牢記：

1、如自己或親友確有治病的迫切需求，在確認藥品來源、用途無誤的情況下，以及符合中國海關進出口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帶回少量、自用的藥品。

2、千萬不要將所購藥品用于銷售、流通。就算只是帶給朋友或者親戚，一旦被轉手，尋根溯源也會查到你頭上，後果也是很嚴重！

3、除了藥品，美瞳、隱形眼鏡等，也屬於醫療器械。代購要謹慎！



皇后區唐人街拉盛的主街上，領航學術補習中心(GPS Academy)的建築，以擠擠挨挨的珍珠奶茶店和紀念品路邊攤上方的中英雙語標牌宣示自己的存在。建築內部，不多不少正好十面三角旗裝飾著主辦公室的後壁，上邊分別印有“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字樣。這些旗子似乎在無聲地對補習中心的學生施加影響，問他們是否敢於想象有朝一日被這些大學錄取的情形。不過他們其實並不需要提醒。他們早就已經熟知這些名字。

大廳牆壁上的一框框里展示著一些簡易證書。每一張以深紅色鑲邊的“GPS Academy Award”(領航學術補習中心獎狀)上都有一個名字，通常是中文名，並列明瞭一些標誌性的成就，該地區的任何家長大約都會因爲孩子取得那樣的成就而慶祝一番(或者只是期盼)。完美的 SAT 分數，“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家向常春藤盟校輸送大量學子的機構的名字。“這就是家長們追求的東西”，領航的創始人兼校長顏謙業(Lawrence Yan)說。“結果。”

領航學術補習中心是一個教育補習公司，專門幫助爲標準化考試做準備。學生來自七至十二年級不等，大多出自華裔移民家庭。在亞裔移民社區里，參加這種集體備考班已經成爲成長必修課，領航這樣的公司置身其中的整個生態系統由此得以形成。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紐約市共有 411 家備考中心——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過去四年間冒出來——多半都位於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尤其是這兩個行政區的亞裔聚居地：法拉盛和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在對面的海岸上，加州的奧蘭治縣、聖克拉拉縣和洛杉磯縣，共有 861 家這樣的輔導中心，那些縣全都是亞裔家庭佔比很高的地方。

與競爭對手的情況類似，在領航，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聚焦於紐約市的特殊高中入學考試(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s Test)，要進入該市的九所特殊高中就必須過這一關。(表演藝術學校拉瓜迪亞高中[LaGuardia High]有一套選拔體系。)參加這一考試的八年級學生當中，只有不到 20% 的人分數能達到進入一所特殊高中所需的最低標準，其中包括競爭最激烈的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和布魯克林技術高中(Brooklyn Tech)。在領航，這一考試的夏季考前輔導班通常每個工作日都上課，每天三小時，費用在 1400 美元左右。不過顏謙業說，他的學生實際上都進入了特殊高中。他之所以知道，是因爲結果一出來他就會送出 Visa 禮品卡：考取史岱文森高中的，能收到 50 美元；布朗克斯科學高中，30 美元；其他學校則是 20 美元。

領航還幫助學生準備其他考試：比如 SAT 和 ACT、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考試，以及紐約高中會考(New York Regent Examinations)。它的教師幾乎可以針對大學申請中任何潛在的弱項進行輔導——即便課外活動和個人陳述也可以通過一對一的大學入學輔導進行策劃。“你知道 GPS 導航系統會怎麼把你帶到你想要的地方嗎？”顏謙業問，“領航學術補習中心基本上就是我們在教育方面實現夢想的地方。所以我們是在爲你導航，帶你到正確的地方去。”

領航員工包括常春藤盟校畢業生和全日制高中教師；一些導師兼具這兩種身份。顏謙業本人在法拉盛長大，高中上的是擇優錄取的達芬奇科學與數學學院(Da Vinci Science and Math Institute)。長大後，他當上了金融分析師，直至 2011 年，當時他感到身在華爾街的自己缺少生活目標，於是轉向了備考行業。“那時我覺得自己只是工序中的一部分”，顏謙業說起他以前的職業。“但是現在，當我的孩子們進入一流學校或者取得非常高的 SAT 分數時，我感到非常

自豪。我可以得到立竿見影的結果，感受到了更多的控制權。”他在當地的中文廣播電台和報紙上爲領航做了大量廣告，但他估計大部分客戶都是通過口碑找到他的。“基本上，”他說，“只要有一個孩子進了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會來問他是在哪里補習的。”

三年前，在領航的紐約高中升學考試輔導班里，卓伊·王(Join Wang)結識了自己大部分最親密的朋友。這個小圈子如今都已經成爲史岱文森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Science)的三年級學生，今年夏天，他們又重新聚在一起上 SAT 備考班。“說起來有點像笑話：‘你們今年夏天打算干點什麼？’‘上預備學校，’”卓伊·王說。“我們都上了預備學校。”

卓伊·王的父母來自中國福建。他說，很難讓他們暢談自己的過去，但是他知道母親來自一個富裕的商業之家，父親則是在農村長大。他們來到美國，一切從零開始，自學英語，攢錢幫助其他家庭成員來到這裡；如今他們在皇后區的艾姆赫斯特經營一家自助洗衣店。在家里，卓伊·王和兩個弟弟住一個房間，屋里只有一張上下鋪的床，這個夏天，三人輪流睡地上的竹蓆。父母帶着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睡在另一個臥室

華人辦“補習班”風氣蔓延至美國

里。就算備考班對他的父母來說構成了經濟負擔，他們也從沒流露過這種情緒，卓伊·王說，不管自己有什麼問題，他們都不理會，只是告訴你：“你還是小孩呢。不要慌，讓我們來操心錢的事。”

顏謙業說，他的很多客戶在經濟上都有困難，但是如果有助於確保孩子進入一個有名望的高中，從而有可能進入一個有名望的大學，那麼他們仍願意支付數以千計的金錢。“這更像是一種文化上的東西，你懂嗎？”他說。“他們寧願不買昂貴的運動鞋，但他們會儘量讓孩子去上非常昂貴的預備學校。”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皇后區學院(Queens College)的社會學教

育學生的比例超過 60%。這也引發了爭議。2012 年，一個倡議團體聯盟提起的聯邦訴訟聲稱，關係重大的單一考試錄取過程對黑人和拉美裔兒童產生了歧視性影響(他們能找到的備考資源和機會更少)，應該將一系列更廣泛的因素考慮進來，比如之前的成績、面試或教師推薦(司法部[The Justice Department]的民權辦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宣佈，它將展開調查，但目前尚不清楚調查的具體情況。只有紐約州的立法機關——而不只是紐約市本身——可以更改學校的招生政策)。

但是，1978 年從布魯克林技術高中畢業的戴維·李(David Lee)說，能上三所競爭力最強的特別高中的學生，並不一定來自經濟條件優越的家庭：他們中大約有 40% 到 60% 的人有資格享受免費或減價午餐。戴維·李是捍衛以考試爲基礎的招生政策的組織聯合教育聯盟(Coalition Edu)的領導人之一，該組織和許多從這些特殊高中畢業的學生都說，文化價值觀和杰出的刻苦工作精神促使來自所有收入階層的亞洲人在特殊高中的系統里表現優異。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詹妮弗·李(Jennifer Lee)說，這種亞裔

例外論的看法滲透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圈子裡，保守派把亞裔的成功作爲反對平權政策的一個主要論據。但她說，亞裔的成功並不意味着其他少數族裔不重視努力工作或教育。她在與周敏(Min Zhou,音)合著、出版於 2015 年的《亞裔美國人成就悖論》(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書中指出，亞裔美國人在教育上的成就實際上源於一種具有高度選擇性的移民政策：2015 年的一份人口普查報告發現，華人移民中多數擁有大學學位，與之相比，美國全國人口中擁有大學學位的人低於三分之一，而在中國本身只有 16% 的人口有大學學位。

受過高等教育的亞裔移民的際遇已成爲所謂的“種族資本”，這是一種可涓滴的知識和資源儲備，通過各種社會網絡——從備考中心到宗教機構，再到移民聚集地區的普通家庭和社會關係——也惠及了條件不那么好的家庭。據戴維·李說，對並不富裕的亞裔移民家庭來說，補課的需求更高：“他們有更多的渴求，”他說。“他們需要這種踏腳石。”而且，由於新移民或是在外國獲得學位，或是根本沒有學位，他們對美國大學的錄取過程一無所知，備考學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必要的工具。“所以，工薪家庭要爲孩子犧牲他們的一切，”他說。

卓伊·王仍然記得八年級時參加紐約市特殊高中考試時的壓力，所有想上史岱文森高中的人都要經歷這個競爭。他在考試開始和結束時都很緊張，覺得自己在答題時太粗心了。他說，匆匆忙忙地做題但不檢查自己的答案，“這是我的一個相當大的毛病。”第二年年年初考試分數出來時，他的初中西班牙語課上一群孩子忙着打開信封看自己的考試成績。他在自己收到的信里看到的分數是“551”，他後來得知，這個分數比讓他在史岱文森高中獲得一席之地分數低了幾分。他強忍着眼淚，直到一個同學注意到他沮喪的臉，表示想給他一個擁抱。他禮貌地拒絕了，卻再也無法忍住淚水。“當時的情況有點像無政府狀態，”他回憶道。“學校有意在最後一堂課上把分數發給我們，就是爲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

相比之下，當晚與父母的談話反而顯得容易了。“我進了布朗克斯科學高中，”他說，好像是在承認自己犯了個小錯似的。“哦，這不是世界末日，”他的父親回答道。但卓伊·王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這麼說吧，他們是我的父母，”他說。“我不想讓他們傷心或怎麼地。”

卓伊·王從來不覺得他的父母是“虎媽虎

爸”，那是一種感情冷淡、總對孩子表示不滿意的亞裔父母的刻板印象，他們用譴責孩子給家庭帶來恥辱的威脅要求孩子成功。卓伊·王說，他的父母只是想讓他快樂。“但我爸也讓我上哈佛，就像所有其他的亞裔爸爸那樣！”他笑着說。

他的話反映了移民子女常常覺察到存在的一種不成文的契約：因爲我們的父母爲我們付出了太多，所以我們將永遠在感情上欠他們的債。這些期望在我的老家加州庫比蒂諾(Cupertino)也讓人感到沉重，庫比蒂諾是一個富裕的郊區，住的都是硅谷從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簡稱 STEM)這種需要高級技術工作的亞裔移民。爲了確保他們的孩子能上當地的公立學校(這些學校在全國的排名都很靠前)，這裏的父母把他們收入中多得離譜的份額花在抵押貸款上，然後還在更多的補習班、音樂課、體育聯隊，以及更多的課外活動上花大錢。

我並沒有像卓伊·王那樣對父母有同樣的感激之情。我把高中的時間花在生氣上了，我恨自己生了一個超級競爭的泡沫里，沒能經歷“真正的”高中生活。到了上 SAT 考試的暑期補習班的時候，我故意上課不專心，也故意不完成家庭作業，這都是爲了讓我父母煩惱。我只是希望我能過一種“正常”生活。但當我逃離灣區，搬到中西部時，我發現，過

正常生活對我來說從來都不那麼簡單，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職場上。《亞裔美國人成就悖論》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也有所觸及：儘管對亞裔人有貌似正面的刻板印象，但我們仍然面臨着詹妮弗·李稱之爲“竹子天花板”的情況，讓我們得不到領導崗位，在判斷更主觀的職業領域得不到承認，這些領域往往對在其中欠缺人際關係的群體不那么歡迎，而且長期以來，亞裔被認爲缺少創造力，還唯命是從。詹妮弗·李說，這就是爲什麼一些亞裔移民父母用非常狹隘的目光來看待他們孩子的未來。“爲了讓他們的孩子成爲成功的少數族裔，”她說，“擁有合適的證書，取得良好的成績，進入一所頂尖學校，可以讓人在一個不太可能經歷歧視的領域獲得流動能力。”

還有一個詹妮弗·李稱之爲“父母炫耀權利”的概念。她指出，當移民來到美國時，他們通常會在社會上、職業上和法律上有一種地位下降的感覺。有些人將永遠無法重新獲得他們以前的地位，只能不得不長期從事較爲卑微的工作。但是，他們可能試圖通過孩子的成功來挽回一些地位。1991 年從史岱文森高中畢業的克里斯·郭(Chris Kwok)，在教會里認識了卓伊·王。克里斯·郭在法拉盛的一個工人階級家庭長大，他的父親在中國時曾是一名工程師，但在皇后區，他是紐約市的一名藍領合同工。克里斯·郭的母親在一家服裝廠工作。克里斯·郭回憶說，第一次上暑期預科班，“我沒有做任何決定。父母說，‘這是你要做的事情。’就那麼簡單。”

在他的記憶里，雖然他在 1980 年代末參加的暑期班“很糟糕”，但至少有一半的同學進了史岱文森高中或布朗克斯科學高中，部分原因是這些課程給學生強加了某種自製力。“我的父母把他們賺來的錢花在我身上，”他說。“所傳遞的信息是，你應該下功夫學習。如果你不下功夫，你知道，你只會感到內疚。”

現在，卓伊·王的高中已上完一半，他有時會想他下一步會去哪裡。他承認他想離開紐約，試着獨立生活一段時間。但他說，“我的首要任務是讓我父母高興，因爲他們爲我付出了這麼多。那之後，才是我做喜歡的事情。”

最近的一個周六，卓伊·王正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泰國咖啡館里登錄查看他的 SAT 成績，他在手機屏幕上點擊着，就像在某種玩手機遊戲。“哦！”他驚呼道，看着眼前的分數，他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檢查我的答案真值了。”

他要慶祝嗎？卓伊·王不確定，這可能爲時尚早。他的父母已經開始掏錢讓他諮詢上私立大學的事兒。他說，等他以後有了一份好工作後，他會有足夠的時間放鬆，追求業餘愛好。這讓我想起了他之前說過的一句常用語，包括我在內的幾乎每個華人孩子都聽說過：“先苦後甜。”



授平甲敏(Pyong Gap Min,音)表示，在中國和韓國等國的多次移民浪潮之後，亞洲輔導行業的痕迹就出现在了美國。平甲敏稱，它們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廢除長期的排外移民法後出現的，不過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韓國和南亞移民大量湧入之後，紐約等城市才第一次明顯注意到補充教育中心的存在。平甲敏認爲，法拉盛的備考中心是那些移民祖國嚴格的“填鴨式學校”的衍生物——在中國叫“補習班”，在韓國叫“補習學校”。這種嚴格的要求被認爲是與中國等國以考試爲基礎的全國教育體系相一致的必要做法——在中國，一次考試決定能上什麼大學。“是儒家在強調孩子的教育，”平甲敏說。“你去中國、韓國和台灣看看，都有課後班，它們被傳到了這裡。”

備考當然是有回報的，來自不同背景的亞裔學生現在在紐約最具競爭力的公立學校里佔多數。在史岱文森高中，四分之三的學生是亞裔，在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和布魯克林技術高中，亞